



纳什均衡和理性余毒

欧阳

约翰·纳什的意外离世,媒体意外地撒播着关于他的文字。之所以说是“意外”只是个人的感觉,因为不知道对纳什的回望到底是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电影《美丽心灵》出售的好莱坞鸡汤,抑或是纳什均衡什么的。

我最早知道纳什就是其名震寰宇的博弈均衡,再加上所谓多国贸易博弈共赢的学说泛滥,于是也似懂非懂地觉得纳什均衡很是神奇。关于这个理论,最广泛的注解是囚徒理论——只有大家都不出卖对方的时候,每个人的利益才会最大化,很美好的样子。

这个在中国有着3亿多人口的庞大群体,这些来自于车间、厂房、工地的一线工人们,他们只是一群平凡的人,是一群走在人群里会立刻被淹没的人,就像他们所发出的声响也会立刻被这个喧闹的社会所遮蔽一样。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自己的诗歌。同以往采访一样,当记者问他们:“还会坚持写作吗?”“会!”每个人都坚决地回答。

关于博弈论这种古怪高深的、非人的纯逻辑数学理论我彻底外行,怎么会和市井小贩心智智动的经济学关联在一起也不大明白,看到祖国贸易赚的钱还不够用来修复环境损失的时候,更不懂有什么精英们会觉得N个囚徒之间的利益博弈会多赢的结局。其实是我孤陋寡闻了,对奇数和贬损纳什的众多经济学家来说,更多的人视之为理性的数学家,甚至有大批叛逆的经济学教授怨诺贝尔奖的滥发,比如奥地利学派,他们会说“别跟我提诺贝尔奖,谁提我跟谁急。”因为在他们看来,博弈论严重违背经济学理论,从方法论上就根本是错误的,因为博弈论研究的是抽象的选择,完全不关涉人的主观智识,所以纳什也根本不是经济学家。

最后这一点好像有点明白,我们崇敬的列宁同志好像就说过,不能用规律,也就是归纳抽象出来的道理去套用具体的事例。不过很多人并不在意这些指导思想,总是以为可以有真理般的学说来畅通成功之路,比如那些专心研究孩童成长经验的家长,不知不觉中会用死记硬背的“成功经验”来残害自己的后代,他们甚至更愿意相信自己孩子不是独一无二。

所谓的纳什均衡是不是也如此这般误导了经济学家呢?这扯得有点远了,实际上不管那些希望从纳什均衡中获得灵感的学者,还是那些痛斥囚徒博弈的专家,甚或是像他这样什么都没搞明白的市井草根,在心智上都有趋近最优“博弈”的贪念,人们习惯于相信基于长远考虑做出的选择是最好的途径,因之总是欺骗自己差异化选择是毒瘤。不妨来看看现在的大学管理方式,国内几乎所有的高级学府都以论文和“专著”之争是激发学术研究的最佳手段,或者人们不同意这样的武断结论,但一定相信在这之外仿佛是没有更好办法的,否则也不会固执地推行这种被诟病的制度。

闲生活、慢生活、新生活,茶楼、书吧、风情客栈,那泓清泉,那簇新鲜,那缕茶香,那份禅意,短短几天,这一切都汇集成为峨眉的缕缕温暖,而那个叫彭文才的环卫工人,那个叫芳雨晴的采茶女,那些抬滑竿的汉子,还有那些爽朗的园艺女工,也正不断交织成我内心的缕缕感动。不正是这些无所计较、不因多少回报,只求安于本职的普普通通的人们的付出,才让每一个游人自由自在,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享受到了他们的劳动与付出,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一份舒心吗?

在位于市区的大佛禅院,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大佛禅院住持永寿和尚交谈。他说,普贤菩萨是实干者,苦行者。我们在生活、工作中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才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人是一个物质精神的二元体,物质丰富了,要提高生活的质量,快乐地生活,就需要精神满足,而“平常心即是佛,平常心即是道”。

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是提着抱着过日子,还是舍得、放下,心平气和自在自然,有所创造,有所成就?释永寿住持此论,或许该是人们体味到的一种禅意吧。

理智本身不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吗?这是福柯想过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困扰的日子不知道是在他清醒时还是疯狂时。这么说由于理性本身几乎是不允许妄念存在的,正是在不断的批判和颠覆中,理性的推演归纳和抽象才逐步精细精致,只是,也许,可能,对本质上还没有摆脱非理性性存在的人来说,理性是有毒性的,就如那些真诚地将来自写进规制的理想主义者,未必懂得宽容的真谛;正常人都容易得到宽容,何况一个疯子。

关于纳什,真不知道人们在念想什么。

有意思的是,在朗诵会进行的同时,由林兆华执导,话剧演员濮存昕、陶虹主演的《建筑师》在天津大剧院的另一间展厅可谓高朋满座,演出结束后,在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的建议下,两个剧组在剧院地下一层的餐厅来了一场特别的聚餐。

听说要和濮存昕一起吃饭,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觉得这个“意外收获”来得太突然。良辰美景,有诗为证,没有脚本,没有彩排,大家开始了一场即兴诗会。濮存昕用他专业的朗诵水平征服了大家,工人们也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人们。

濮存昕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的文字很有想象力,修辞,比喻都用到了,感情那么真挚、质朴。”

秦晓宇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写的诗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而这是文学审美之外的意义。”

这个在中国有着3亿多人口的庞大群体,这些来自于车间、厂房、工地的一线工人们,他们只是一群平凡的人,是一群走在人群里会立刻被淹没的人,就像他们所发出的声响也会立刻被这个喧闹的社会所遮蔽一样。

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自己的诗歌。同以往采访一样,当记者问他们:“还会坚持写作吗?”“会!”每个人都坚决地回答。

秦晓宇说:“从去年策划到现在,通过努力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大的改观,比如在‘五一’劳动节之前中央电视台记者专门去上海找到我们,我们推荐了几个工人的作品,新闻联播随后播了郭霞、田力的诗歌。”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因为售票不理想,原定于3月份的演出推迟至今。虽然这次也只卖出67张票,但工人诗歌朗诵者没再爽约——

发自一线工人心底的那声呐喊

本报记者 周倩

5月23日,天津大剧院,一场迟到的诗歌朗诵会正企盼着观众的到来。因为售票情况不理想,本定于3月的演出推迟至今,虽然可容纳200多个座位的剧场只卖出67张票,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爽约。

这次诗会的主角是一线的普通工人,这是他们第一次站在国家一级剧院的舞台中心,并高声朗诵自己的诗歌。

台上,他们是略带羞涩的诗人

天津大剧院小剧场的舞台被布置得粗犷、简单,几把小板凳,一套学习桌椅,一把吉他,角落里的几张宣传栏上贴满了各行各业一线工人的特写照片;一个书架上放着一些散落的书和两顶黄色的安全帽……这一切的陈设都在预示着一场朴素、真实的诗歌朗诵会将开场……

卖票加上少数赠票,演出正式开始前小剧场里有过半的座位坐了观众,他们中有90后大学生,有70后80后的青年,也有半世沧桑的中年人,还有几个和父母一起来的孩子。晚上7时30分,演出正式开始,除了民族的吉克阿优身着民族服装外,其他工人都穿着工装或穿迷彩服和牛仔褲,一如他们平日在工厂一样,唯一的女工郭霞白衬衫加绿裙子的打扮为诗会增添了一丝柔情。

随着一首《车间女孩》悠扬的歌声,3个身穿白色T恤的女孩轻声唱起:

脱去喜欢的衣裳/换上统一的服装
踏入喧闹的车间/看到对班疲惫的脸
……

《我的诗篇》纪录电影第一次公开放映:搭载工人下矿井的电梯,安全帽下一张张黧黑的脸,乡村公路上缓缓驶离的摩托车,电钻喷出繁星般的钢花……一个个工人陆续登台,背景音乐里播放着矿井下叮当作响的水滴声,车间里嘈杂的机器声,他们用平缓甚至略带生涩地声音朗诵:“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轻盈/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长满着鸭毛/我被叫做‘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

再见面就好像老朋友一样开心。”

老井,是他们中比较年长的一位,今年47岁,他告诉记者,他写诗有20多年了,煤矿工人的身份让他的诗歌也成了煤矿工业的一部浓缩发展史,他的诗歌里表现了从用手镐刨煤到电钻挖煤到现在大机器铲煤的发展变化,老井说:“产煤机的使用让采煤变得简单了,安全了,多效了,收入也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的增长了,只是现在招工没有以前多了。”机器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抢”了很多工人的饭碗。

“写诗,纯粹是个人爱好,顶多换个烟酒钱,对生活改善毫无作用。”从江苏到广西,从浙江到四川,几乎奔波了大半个中国的制鞋厂工人唐以洪告诉记者,辗转奔波、居无定所,对于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坚持写诗,他们的回答都是说,“因为喜欢。”因为喜欢,他们专门请假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因为喜欢,他们可以在深夜工友都早已酣睡时趴在被窝里举着手电筒读诗、造句。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田力,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郭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吟诗呐喊声

书法、漫画:李法明

人在他乡

打工文学精英 ③

东莞,我的兄弟在你的床上

(外二首)

泥文

兄弟渝东北人,小姓倪,今年41岁,93年到东莞,92年用上海作跳板,脑子里揣着九年义务教育,肚子里囤着锄头犁耙镰刀,那时,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三餐之莞城话,上幼儿园,进小学,读高中,名列前茅的成绩,在电话里回过老家老同学

自己开玩具厂,你没想到在常平,你扎下根,散出叶,你那身体瘦软面色蜡黄的小山村没有想到你就是个从高考的崖上跌下来的牛犊前途途漫在乌鸦的羽翼下

东莞是一个打工翻炒热络的词,你抱着黑色的翅膀,一头扎进去,在流水线上学割胶,蛙泳,蝶泳……你畅游于玩具的海洋分解,组合,建构,在玩具的新陈代谢里你血液的温度升高,再升高,沸腾成你向前的方向

老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是感受到了,东莞的温度,企业报,乡镇刊物,市文学刊物,他们将你的视野拓宽,让你的思想拿起笔,说你漂泊的酸,游走乐,说你在东莞的土地上开出的花,从流水线到仓管,从仓管到企业报,从豆腐块文字到作家,这一过程,你事先没有想过,也无规划,这是方文化温暖了你,热络了你羞涩的笔触,做成弓,搭上箭

前方有一个文字的太阳,你起步,练走,开跑,习一幅儒雅风范,偶尔回想,如果在故乡,你一定是牛,只知咬牙拖犁耙犁

老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是感受到了,东莞的温度,企业报,乡镇刊物,市文学刊物,他们将你的视野拓宽,让你的思想拿起笔,说你漂泊的酸,游走乐,说你在东莞的土地上开出的花,从流水线到仓管,从仓管到企业报,从豆腐块文字到作家,这一过程,你事先没有想过,也无规划,这是方文化温暖了你,热络了你羞涩的笔触,做成弓,搭上箭

前方有一个文字的太阳,你起步,练走,开跑,习一幅儒雅风范,偶尔回想,如果在故乡,你一定是牛,只知咬牙拖犁耙犁

老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是感受到了,东莞的温度,企业报,乡镇刊物,市文学刊物,他们将你的视野拓宽,让你的思想拿起笔,说你漂泊的酸,游走乐,说你在东莞的土地上开出的花,从流水线到仓管,从仓管到企业报,从豆腐块文字到作家,这一过程,你事先没有想过,也无规划,这是方文化温暖了你,热络了你羞涩的笔触,做成弓,搭上箭

前方有一个文字的太阳,你起步,练走,开跑,习一幅儒雅风范,偶尔回想,如果在故乡,你一定是牛,只知咬牙拖犁耙犁

老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是感受到了,东莞的温度,企业报,乡镇刊物,市文学刊物,他们将你的视野拓宽,让你的思想拿起笔,说你漂泊的酸,游走乐,说你在东莞的土地上开出的花,从流水线到仓管,从仓管到企业报,从豆腐块文字到作家,这一过程,你事先没有想过,也无规划,这是方文化温暖了你,热络了你羞涩的笔触,做成弓,搭上箭

前方有一个文字的太阳,你起步,练走,开跑,习一幅儒雅风范,偶尔回想,如果在故乡,你一定是牛,只知咬牙拖犁耙犁

老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是感受到了,东莞的温度,企业报,乡镇刊物,市文学刊物,他们将你的视野拓宽,让你的思想拿起笔,说你漂泊的酸,游走乐,说你在东莞的土地上开出的花,从流水线到仓管,从仓管到企业报,从豆腐块文字到作家,这一过程,你事先没有想过,也无规划,这是方文化温暖了你,热络了你羞涩的笔触,做成弓,搭上箭

禅意峨眉

捡上来。还有,就是救助失足坠崖的游客。

“退耕还林,我就来到了这里。刚开始只是想试试,这一试就是15年。平时吃住住在山上,十天半个月能下趟山,七八月份游人多就回不了。父母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爱人走了,孩子在市里上学,没了母爱,也缺少父爱。但这个活儿总得有人做,我是当地人。”说这些话时,他始终微微地笑着,像讲述别人的故事。

一根顶端带钩的钢管,一个装垃圾的背包,一双黑布鞋,一身红色信号服,每月2100元的收入,这似乎就是这位环卫工的全部,但他又十分知足,“崖壁上的垃圾一年比一年少,人们的素质提高了。”休息片刻,他又悬挂绳索没人山崖。远远望去,山崖间,一抹云彩在飘荡。

在峨眉山间,那一大片的绿清泉般在流淌。那片绿啊,对城里人而言,看一眼就是一种奢侈!

这是一个位于峨眉海拔1000多米处的高山林间茶园,一个峨眉雪芽的种植基地。在一垄垄的茶树间,手抚流淌着的绿,我满心欢喜地采撷着,陶醉着,直到被一位叫芳雨晴的茶姑唤醒。

“您采的都不能制茶,只能叫树叶!”看着我惊讶的表情,她细细讲解,示范:此时茶垄已唯采到雪芽,只有嫩芽初生刚刚冒出的才能做成雪芽茶,“茶树最顶端的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才能入茶,叶可制成毛峰,而那根细芽才可做雪芽,稍稍下面一点的,就是人品级的树叶了。”

狼狽逃出茶园,林荫下,茶姑为我沏上一杯峨眉雪芽,立即绿意盈杯、香馥四溢。“雪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渚春。”陆游所在的彼时,每年春发,茶僧便开始一年一季的茶事生产,踏残雪采摘新茶。此时,山中雨雪初霁,平畴微微春回,峨眉鹤鸟飞绿,春芽破雪

而出,道佛两门踏雪品茗,成为一道禅意风景。

远山含黛,近树叠翠。置身桉树、银杏、松树交织下的茶园侧畔,在枝叶筛落的细碎阳光中,小芳娓娓道来:一场春雨一茬茶,雪芽的采摘期很短,即便清明刚过,能采的芽也已经很少了。采茶时节,茶人最是忙碌,但一天最多也就采一两斤湿茶,“人们一直弯得腰采摘,根本没时间去下山”。

“那么辛苦,收入不会少吧?”“每月2000多元吧。数千亩的茶园,采不回来就太可惜了。江南江北,多少人喜欢茶哩。”小芳笑道。

茶之味,在于品,禅之意,在于心,而禅茶于山水,方得其中之真味。

峨眉山猴是游人喜爱的珍兽之一,而我,独喜山猴游荡处的清音阁景区那满沟的水,满山的绿,满坡的暖。

在峨眉海拔五六百米的停车场下车,步入清音阁景区,单程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去观猴,更为观猴。

那水,是从景区深处汨汨而来的,与路相伴,清澈得使游鱼如同悬浮,伸手可触的绿,诱惑着我不时想触摸却不忍碰痛其每一缕叶脉。在温暖的阳光下,只愿这样随意地走着,任微汗驱走寒意,直到看到后背数字的抬滑竿者。

80元抬到猴区,除了管理费,两个人平分。他们每个人都黑瘦精壮,脸上淌着汗水。闲谈得知,抬滑竿者都是当地人,家里也有为游客服务的小生意,“家里人照顾生意,日子过得去。我再卖把子力气,也方便出来的老工人和娃子。挣多挣少,图个大家方便。”一位李姓汉子笑着说。

在山上,不时看到山下一大片明镜似的湖面,那是一个叫峨眉秀湖的景区。当地人介绍,这个景区面积有五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



幸福圆满来自于无限宽容与相互尊重。

赵春青画

全国环保科普创意大赛北京赛区开赛

本报讯 5月26日,“环保新生活——2015年全国环保科普创意大赛北京赛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本次比赛以“我身边的环保知识与环保行为”为创作主题,征集作品包括动画、漫画、微电影和摄影作品四种形式。大赛面向高等院校学生及社团,动漫学院在校学生及社团,各省环科院、监测站、环境学会、宣教中心以

及社会组织的动漫、摄影爱好者,社会动漫和电影企业,动漫、电影、摄影协会等征集作品。比赛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作品的科学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核,评选出组委会大奖一名,各类别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名,部分优秀的作品将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进行展播和推广。(赵春青)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正式出版

本报讯 (记者赵朝 通讯员王志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一书近日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这是全国第一本反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的史书,真实地再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该书由井

冈山市总工会组织人员精心编写完成,书中许多材料为首次发掘、整理和披露,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研究的新突破、新课题、新成果,将填补井冈山斗争史的研究空白,对井冈山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将产生积极影响。